

陈洵与清季以来粤港澳区域的词学谱系

黑白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粤港澳因其地理位置、对外交流之利, 往往能最先捕捉到时代风云之变。具体到词学领域, 就是形成善领一时之先的区域特质。由此出发, 或可勾勒出粤港澳区域的词学谱系, 一条主线是聚焦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 三条支脉则涵盖从岭南到粤港澳的区域概念转型、从传统词家到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型、从学词到词学的研究理念转型等。与此相应, 词学谱系的形成离不开聚集在文化英雄周边的词人群体。陈洵正置身于粤港澳词学的谱系之中, 以岭表词宗的身份, 深度参与了区域词学的体系建构。首先, 陈洵著《海绡词》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并举, 结合在大学课堂的词学授受、与友人之间的词作唱和等, 其所明确的学词范式, 深深影响了词体的发展历程。其次, 陈洵著《海绡说词》以章法结构点评为主, 深刻影响了后来者的词学研究路径, 初步形成一个由印象式点评到结构化分析的范式转移。在陈洵之后, 詹安泰、罗忼烈、朱庸斋、邱世友、施议对、陈永正、黄坤尧、彭玉平等学者, 莫不走向全国范围, 且在各自领域推陈出新。粤港澳词学善领一时之先的特质, 可谓薪火相续、代不乏人。

[关键词] 陈洵 粤港澳 词学谱系 海绡词 海绡说词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6)04-0036-09

一、引言: 粤港澳词学谱系初探

晚清近代以来, 粤港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往往得风气之先, 在社会文化变革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词学方面, 则既有传统之执守, 又有自出机杼的新变, 二者相互交织, 并与其他区域频繁互动。文献整理方面, 在词坛领袖朱祖谋(曾任广东学政)的感召之下, 叶恭绰辗转香港等地完成《全清词钞》的编纂工作。在“词学”方面, 出生于广东新会的梁启勋(梁启超之弟), 撰写《词学》一书, 于创立现代词学体系方面, 颇有引领之功。在“学词”方面, 同样出生于广东新会的“岭表词宗”陈洵, 为学词范式的树立和词学批评的理论进路抛出金针。至于陈

洵弟子朱庸斋, 以及接替陈洵任中山大学词学讲习的詹安泰, 分别从词体写作、吟诵技艺、词统建构等方面, 为传统词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随着近现代社会交通逐渐便利, 词学的区域联动也大大加强, 比如龙榆生曾在广州执教, 陈洵词友谭瑒卿则北上京城结交众多名士, 许多词家的足迹亦遍布全国各地。香港和澳门区域的词学, 则有着“国家不幸词家幸”的历史背景, 众多内地词人都有避难于港澳的经历, 如杨铁夫在香港完成《吴梦窗词笺释》等重要词学著作。抗日战争时期, 陈洵避难澳门结交众多词友, 其弟子冯平更在澳门发起“雪社”。而今区域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港澳地区汇聚施议对、黄坤尧、张宏生、张健等一众

收稿日期: 2025-04-13; 修回日期: 2026-01-26

作者简介: 黑白, 文学博士、特聘副教授, 主要从事词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优秀学者,均活跃于词学研究前沿。对以上种种学缘关系进行深入挖掘,足以呈现粤港澳词学的离散聚合、复杂流脉和对话谱系。在此基础上,粤港澳词学又具备怎样的区域特质?与其他区域有怎样的交流碰撞?对现代词学的整体发展做出过何种贡献?新时代的粤港澳词学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都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由此出发,我们不妨先初步勾勒出粤港澳区域的词学谱系,包括从岭南到粤港澳的区域概念转型、从传统词家到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型、从学词到词学的研究理念转型等。岭南词学肇始宋季,有历史记载的共有9人。元明之际,则有词人27位。岭南词学绵延不绝,但真正形成全域、全国影响力,还是要溯及清代以来。自清初岭南三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流风所播,粤东三家(叶衍兰、汪琬、沈世良)紧随其后,“粤词丝竹清雅而时出恢奇的情致”^{[1](P103-107)},这在陈澧身上亦有延续。晚清以降,粤港澳词学逐渐走向极具特色的现代转型之路。既有叶恭绰在词学文献上的重要建树,又有梁启勋在词学观念上的新变,此外承续传统批评之学的陈洵、杨铁夫诸家,亦在理论建构层面走上了“寓革新于传统”的革新之路。此外,潘飞声、张德瀛、廖恩焘、黄遵宪、康有为等,都颇具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新中国成立后,以詹安泰、饶宗颐、罗忼烈、朱庸斋、邱世友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人纷纷崛起,再经施议对、陈永正、邓乔彬、刘斯翰、黄坤尧、张海鸥、赵维江、张宏生、曾大兴、彭玉平、余意等新一代学者之接续发挥,粤港澳词学呈现出层次繁复、样貌多变的学术谱系。这一词学脉络的影响早已迈出区域限制,不仅与历代词学中心如浙西派、常州派等频繁互动,也辐射至整个华语文化圈层。

简言之,粤港澳词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从岭南或广东的省别观(单指海南未建省前的广东),到广东、香港、澳门词学研究的大区域互动,包括广东词学在传统词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主导下的突破与创新、港澳词学对海外

汉学的吸收借鉴等。比如前有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借鉴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对传统词学的体系化改造,后有詹安泰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传统词学的价值重估与词统存根。二是词学研究者的身份逐渐从词人过渡到知识人,如广东词坛向有世家传承之风,后逐渐涌现众多词学社团、学术刊物,学者也从以词闻名向以立论为己任过渡,共同参与了从学词到词学的现代转型。三是词学主导观念的转变,从寄托说、境界说、词心说等,萌发为深具现代学术意味的文学地理学等。^[2]从内在逻辑来说,将上述三种转型路径置于粤港澳词学的区域研究之中,不仅能探明区域内部的词学互动,也有助于理清区域之间和区域外部的词学互动,实现从特殊到一般、从区域到普遍的理论升阶。

二、陈洵与粤港澳词学之学缘

陈洵在1929年秋致朱祖谋的书信中提及:“洵于是始受聘书,今上课已半月。”^[3]据此可知,陈洵于1929年秋季学期,正式受聘为中山大学词学讲席。陈洵赴中山大学教书,有赖于朱祖谋大力推荐。最初,中山大学本想聘请朱祖谋,但他自陈“暮齿孱躯,讵堪此任”,遂致信力劝陈洵出任此职,认为陈洵“高踪密迹,尤为相宜”。^{[4](P501)}陈洵回信时,表达了旧派词家的忧虑,“诚恐生徒难教,又新旧冰炭或不相容,则为先生辱耳”。伍叔悦的造访,帮助陈洵打消疑虑:“始知近日学风已变,教授惟有上堂授书,此外皆非吾事。”^[3]后古直前来,与陈洵详细商定课程设置。

在授课内容方面,陈洵在给朱祖谋的信函中亦有提及:“下期校课拟广选两宋诸家,以证周、吴,使学者知其浅深高下与源流分合之故。”^[3]这也与他当时撰写的《海绡说词》不谋而合,故《说词》亦有备课讲义之功能。在授课方法方面,主要以诗词吟诵和文本细读为主。陈洵初到中大任教之时,选读其课程的学生并不多,然而聆听他的几堂课后,众生如沐春风,

大表钦佩。此事一经传扬,引得一些未选课程的人也慕名来旁听,使本能容纳百余人的课堂挤满了人。罗子英记录了这一实况——“述师讲词,绝无高谈雄辩、语惊四座之态。他只端坐坛上,运用柔和的语调,娓娓而谈。听者虽众,却都倾听肃然,鸦雀无声”。^{[5](P26)}陈洵经常在课上用粤语吟诵诗词,古韵清朗。陈洵讲课不像新派教授般大开大合,动辄从文学史、词学史、社会史等角度展开宏大叙事,他每小时只讲一两首词,倒是颇类英美新批评派之文本细读。^[6]当然,此种细读的功夫与深度,势必对学生资质要求甚高,在知识普及层面有着天然的劣势。据龙榆生回忆,陈洵的授课也因较为深入,不能被所有学生理解、消化:“可是他说得太高了,专门对学生讲梦窗词,学生不能够个个了解……其实我的词学功夫,和海绡翁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不过谈起学生的受用来,我教的比较容易消化些罢了。”^{[7](P175)}

然而,陈洵授课之目的并不在普及学术知识,而是传授作词心法,他的词学以学词为最终目标。陈洵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分析每首词作的精妙之处,引发学词者的明悟。他的词学弟子裘尚中曾回忆道:“淮海词《浣溪沙》‘漠漠轻寒’一阙……迨聆述师讲授,指出‘宝帘闲挂小银钩’一句,乃逆点作结,然后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二句,实为闺中人‘闲挂小银钩’时之眼中景物。循此求解,即觉全词活跃如生,读之令人如见其人,如亲其境,如炙其情。”^[8]

再如陈洵解说吴文英词《风入松》(听风听雨)时,会先将原词吟诵一遍,再着重分析“愁草瘞花铭”句的含义。时人每将“愁草”二字,解读为愁容惨淡之青草。陈洵则认为这一“草”字是“草拟”之义,下文所言“分携”“中酒”“晓

梦”,及至后阙之“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皆是从“草”字生发而来。裘尚中言,经过陈洵此番指点,则全词顿通,意义了然。^[8]

由此可见,陈洵在中大之授业,“分析不厌求详,金针暗度。其聪颖特殊子弟,能领悟而以填词自见者,颇不乏人。所谓‘岭表宗风’,自半塘老人倡导于前,海绡翁振起于后,一时影响所及,殆驾常州词派而上之”。^[6]陈洵在中山大学的词学弟子余铭传、裘尚中、马庆余、曾传轺^①等人皆学有所得,中大词人群体的词作颇丰,对彼时的岭南词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陈洵在这一时期俨然初步具备了岭表宗师的风范。

陈洵在授课之外,不喜参与校中杂事,但对中文系举办的词学活动比较支持。中国文学研究会于1931年曾出版《诗词专刊》六卷,其中卷二载有陈洵《海绡说词》的通论部分,卷六有陈洵词《点绛唇·庚午岁暮,风余小集,为拈此解》一首。“风余”指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1930年组织的词社,陈洵在1930年致朱祖谋的书信中即谈到此事:“校事及纷纭,(向不出席,校长请饮亦不到)惟都与洵无关;惟有上堂讲授,是我事尔。《说词》数月来未有增。近校生举词社,名曰风余,月一命题,请洵阅卷。”^[3]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古直,亦曾参与词社活动,《诗词专刊》中有其诗《风余社同人宴集文园作歌》一首。陈洵弟子裘尚中有词四首刊于《诗词专刊》卷之五,余铭传有词三首载于卷之六。

1933年初,中山大学中文系创办了文言期刊《文学杂志》,古直任主编,其门人黄纯仁任协编,此刊目前留存可见14期,最后一期刊于1937年3月。封面有陈洵所署“文学杂志”之标题,除第10期外,每期都收录了《海绡词》中的作品。^②此外,第2期刊有陈洵弟子马庆余遗稿(词二首);第2期、第4期分别刊有余铭传词

①马庆余为广东顺德人,诗文皆高,词规摹南宋,为陈洵所推许。惜天不假年,二十而卒。曾传轺为广东番禺人,年二十六而卒,有《曾传轺遗稿》。

②陈洵刊于《文学杂志》的作品,多为黄纯仁从《海绡词》中录出,部分文字与《海绡词笺注》略有差异。如《宴山亭·九日风雨登高同风余诸子》:“漉巾爱酒,破帽簪花”,《海绡词笺注》为《宴山亭·辛未九日,与风余诸子风雨登高》:“漉巾爱酒,岸幘簪花”。

一首、诗词各一首；第4期、第6期分别刊有曾传轺词一首。以陈洵授课为核心，以社团和杂志为阵地，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体，一个新的词学群体正酝酿而成。

可惜好景不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文系师生迁至云南澄江、广东坪石、梅县等地，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办学。陈洵并未随任，词学群体遂戛然而止。据陈洵长子士谷先生所言，抗战期间陈洵虽未随中山大学内迁云南，校方却未停止发放薪酬，故陈洵在举家迁居澳门后，仍时时回校探视。及至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又通过香港付薪。中山大学此举，足以看出哪怕在动荡年代，或者说尤其在乱世之中，国家、学校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皆不减分毫。直到1945年秋，日寇投降，余铭传自赣南返粤，拜扫陈洵之墓，并访师母冯氏夫人。是时，冯氏已老病缠绵，把保存的海绡词稿托付于他。此后冯氏去世，余铭传因生活在各地辗转奔波。直至1959年，乃将词稿转托好友罗子英（二人同学词于陈洵）。罗氏得到梁寒操的援助，《海绡词》第三卷遂得以刊印。^[9]

在陈洵众多弟子之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朱庸斋。他1935年以年家子的身份从游于陈洵，曾任职于广东大学、文化大学，以及广东文史馆，所著《分春馆词》与《分春馆词话》皆为人称道。佟绍弼《分春馆词》序云：“邇来能词者，陈述叔一人而已。……述叔死矣，而庸斋春秋方富，绍述叔起而讲词，更十年或二十年，行见弦歌之声，洋洋盈耳。”^①娓娓道出了朱庸斋对陈洵词学的承续。朱庸斋在《与女弟陈宝珍书》中亦对此进行追溯：

“予自十岁为诗，古文，年十五而多从先父挚友陈述叔先生游。其以词蜚声海内，任教中山大学，乃见猎心喜，舍诗文而学词。”^{[10](P10)}

朱庸斋的这段话表明，陈洵是他学词的启蒙老师，正是在陈洵的影响下，他才“见猎心喜，舍诗文而学词”。陈洵对吴梦窗的推崇，朱庸斋也一并消化吸收。但朱庸斋并非仅对陈洵

一味沿袭，他自述其性情并不适合陈洵早期词学的艰深滞涩，故而终无所成。^{[11](P14-16)}于是他将目光放向朱祖谋、陈洵的晚期词作，终于发现他们纷纷走出梦窗束缚，乃至去貌存神、学古而有我。^{[11](P20)}这一体认可谓抓住了前辈词人“学梦窗”的精髓，他们是将“学梦窗”当作攀登词学殿堂的阶梯，而非终点。后世学人若不加分辨地将之与梦窗词严格绑定在一起，就难免造成认知上的错位。“学古而有我”不仅是朱祖谋、陈洵等人的毕生追求，也是朱庸斋的学词准则，他通过对陈、朱等前辈词人的学习思考，创作确已卓然成家，自具面貌。钱仲联认为朱庸斋的词作是“天水正宗，海绡传钵”^{[10](P345)}，而陈永正则指出朱庸斋与陈洵词风不甚相似的另一面^②，这同中有异的现象，正是“学古而有我”的具体结果。

朱庸斋的词学论著《分春馆词话》，乃是其门人弟子对师门往来信札、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其主要成就在艺术技巧的阐释分析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是与《海绡说词》一脉相承的。《分春馆词话》中，时时能见到陈洵词学的存在，如：

在一组之中，将意道出又使不尽，而另用笔转换别一意境，常州词派所谓“笔笔断、笔笔续”……陈述叔先生于此特标出一“留”字，金针度人，有益于词界匪浅。^{[11](P28)}

梦窗字字有脉络，其妙处不过其避熟就生，飞跃转变较快，常隔一二语始遥接上文耳。^{[11](P24)}

以上二则，均强调了作词“用笔之法”的重要性，这与《海绡说词》的治学路径如出一辙，且将《海绡说词》中的“留”“笔笔断笔笔续”等语焉不详的术语，用较为清楚明白的话语阐释出来。此外，注重虚字、学汉魏六朝文，也是《海绡说词》中较易受到忽视的观点，陈洵认为学词者应“深通汉魏六朝文笔以知离合顺逆之法”，朱庸斋则将其继承了下来：

述叔先生评梦窗《澡兰香》“盘丝系统”

①参见朱庸斋. 分春馆词. 广州诗社编印, 2001: 1-2.

②参见陈永正. 分春馆词话与分春馆词略论. 江门市蓬江诗社内部刊印资料.

词,辄云“金针度人,全在数虚字”。……前人论作词,须学古文,尤其汉魏六朝文,学其笔调变化,层层脱换。^{[11](P33-34)}

对比来看,《海绡说词》多有晦涩、难解之处,朱庸斋之说则比较明白晓畅。除此之外,朱庸斋也在《分春馆词话》中提出了一些与陈洵不同的观点,如:

词法问题,余与海绡所说相异,海绡斤斤于求法。其所说梦窗词,如往日之经股文批。试思作家如于下笔之前,已存如何运用法度之念于胸中,得毋拘滞而有损于性灵乎?^{[11](P29)}

可见,在词法问题上,朱庸斋自饶学理,他主张“性灵”,不赞同陈洵斤斤于求法,以“经股文批”的方式说梦窗词;关于“拙”之一境的探讨,朱庸斋认为陈洵以“留”字诀代替“拙”,仍然隔了一层,并不准确。但反对也是建立在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从朱庸斋的说词脉络中,随处可见《海绡词》与《海绡说词》对他的影响。立足于岭南词史,朱庸斋对《海绡词》作了较高的评价:“述叔当为大家,开岭南风气,自海绡出,粤词始得正声。”^{[11](P121)}除了词的创作之外,陈洵亦教授吟诵之法,朱庸斋跟随陈洵学词,同时习其吟诵,但其声调与陈洵不尽相同。陈洵的吟诵之法来源于黄元直,黄氏则师从陈澧,陈洵还吸收了粤曲拖腔的技巧,故其声调十分委婉动人。而朱庸斋的师承更为复杂,其祖父朱文熙曾从学者朱次琦游,父亲朱恩溥又是康有为的弟子,朱庸斋复又跟随陈洵学词,可谓传承了以上诸家的吟诵之法。

三、《海绡词》与粤港澳词坛风尚

陈洵确立的学词范式脱胎于周济,“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12](P4838)}这一“立周吴为师,退辛王为友”的学词范式也影响到不少后来者,如朱庸斋谈

及自己学词途径时说:“余为词近四十年,方向始终如一。远祧周、辛、吴、王,兼涉梅溪、白石;近师清季王、朱、郑、况四家。”^{[11](P14)}这与陈洵继承常州词派的主张基本一致。冯平编纂《宋词绪》,序云:“尝从海绡翁游,于词学之源流正变,温柔敦厚之微旨,与夫顺逆离合之所在,翁时时为言不厌。……今兹《宋词绪》之编纂,即本周(周济)陈两家之说,融会而贯通之。”^{[13](P1)}中有“师周吴第一”“问途碧山第二”“余子为友第三”等几个部分,其选词标准即融合了周济、陈洵两家之言。

陈洵对岭南词坛的影响,不仅是“师法周吴”的学词路径,还体现在创作风气之代际传递,正如朱庸斋所言:“吾粤词学兴盛较晚(宋代诸词人中,粤籍仅占六人),粤东三家词风格如一,多破碎浮滑之作,本已不足称。吴兰修学浙派而趋于末流,每多绮靡纤弱之处,且其意境有如闺阁女子,风格不高。兰甫雅正而略欠空灵。述叔当为大家,开岭南风气,自海绡出,粤词始得正声。”^{[11](P121)}朱氏所谓“粤词正声”,其实是强调作词须有浑融的气象和深沉的情感寄托。《分春馆词》在语言风格上虽与《海绡词》并不相类,但在艺术内核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陈洵的词学弟子马庆余,深得乃师学词之谛,饱读经史及汉魏诗、古文辞,作词规摹南宋已入门径,惜天不假年,二十而卒。存词仅六阕,陈洵称赞为“直登宋人之堂”。如《瑶华·落花》:

余香惜蝶,堕影争鱼,渐花风吹彻。流尘换了,空泪眼、一点芳心愁结。信知重好,但又到、经年离别。为有情、赢得今来,褪粉枝枝空圻。

教谁寄语题红,直须怨东君,休怨鸚鵡。托根何处,莫更问、落溷飘茵难说。江南好景,都无奈、多时虚设。想旧家、瑟锦年华,竞斗芳菲时节。^{[14](P48-49)}

此词为陈洵盛赞,评曰:“语语咽,笔笔转。顺逆吞吐,恻惻缠绵。是深得宋贤三昧者。”^{[14](P49)}词咏落花并寄怀人之思,极迷离惝恍之致。上阕从花与人两处着笔,每韵作一转折却又自然

衔接;下阕句句用典却极其自然,更显得游思缥缈、情致顿挫。结句之“瑟锦年华”与上阕“褪粉枝枝”遥相呼应,惜花之情、怀人之思溢于言表。这就与陈洵推崇的周、吴一脉若合符节,马庆余可谓得海绡之真传者。可惜年华不与,猝然早逝。屈向邦为其遗像题辞,良可叹息:“痛失传人海绡老,愚也不愚年损早。遂令天下父母心,但愿生儿愚且鲁。”^①陈洵为马庆余词集撰写的序言《小媚秋堂词序》可谓情真意切:“马庆余遗稿,览之凄然。忆庆余从余学词,既入门径矣。余曰:学词须读书积理,庆余则攻经史及汉魏诗、古文辞,亦略有门径矣。观其劬苦精进,将期于古作者,而竟死矣。此稿词六首,直登宋人之堂。世有知音,当不以余言为过。”^②

在词的创作上深受陈洵影响的还有冯平。冯平字秋雪,广东南海人,诗词兼擅,曾在澳门与弟印雪等人组成诗词团体“雪社”,并有诗刊出版。中岁以后,冯平从陈洵游,在词学理念上深受其影响,也是其创作历程的重要一步。抗日战争期间,冯平避居香港,词笔愈加深婉老练,如《四园竹》:

斜阳薄薄,暖上袷衣襟。绕堤瘦水,凝海痴云,摇荡孤吟。朝市换,天涯泪暗,有谁来慰登临。

烛深深。宵分梦落觚棱,飘灯往事重寻。坐对明河有烂,休向东君,说与晴阴。花未寝。听寇警,愁边坠客心。^[15]

此词有意追摹周邦彦《四园竹》(浮云护月),以清冷朴拙之笔抒写凝重的家国之思。

“飘灯往事”潜藏在对外物的细腻摹写中,结尾之“听寇警”一语惊人,前述种种登临愁思,至此皆蒙上一层国势动荡之叹。冯平早期词作亦对吴文英有所仿效,如重视藻绘的《莺啼序》(西风嫩寒),后在陈洵的影响之下,逐渐向周邦彦之沉郁拙厚靠拢,词艺可谓渐入佳境。

从陈洵与其弟子的教学互动中不难看出,

传统词家,其教学重点都在于词的创作,词作批评与赏析也都是为了提升审美、素养,最终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民国时期的词学教育主要依托现代学校的教育模式,同时又保留中国传统词学传授的一些特点。其基本特点是强调实践性,非常注重学生创作技能的培养。^{[16](P62)}

综上,陈洵不仅在中国词坛“开岭南风气”,为粤词正声,更是通过词学授业将之传承下去。其门人弟子的作词实践,均可见出陈洵所立学词范式的影子。后在朱庸斋的引领之下,其门人陈永正、蔡国颂、李国明、张桂光等人,均继承粤词风雅。据统计,清代各省籍的词人数量虽以江苏2009人和浙江1248人领先,但排行第三、四位的安徽200人、广东159人亦堪称词坛副中心,岭表宗风可谓代有传人。^[17]

四、《海绡说词》与粤港澳词学走向全国

晚清近代之词学,恰逢古典向现代的转向。古典形态的词学侧重于对填词创作的指导,以江顺诒辑、宗山参订的《词学集成》为标志,旨在示后学以填词创作之正途;现代形态的词学则是以梁启勋的《词学》为肇端,至龙榆生正式将词学与学词做了区分,“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龙榆生进一步主张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的基础上,增加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初步确立了现代词学的学科体系。^[18]

批评之学,作为现代词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除延续传统词话类作品对词意、格调、境界等层面的主观批评之外^③,特意强调批评之学的客观成分,即“今欲于诸家词话之外,别立‘批评之学’,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

①②参见马复,马庆余.媚秋堂诗 连语小媚秋堂词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③如浙西词派的“清空”,常州词派的“寄托”,谭献的“折中柔厚”,陈廷焯的“沉郁顿挫”,况周颐的“重拙大”等。

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19](P97)}但所谓“现代词学”,同样不是凭空出现的,“常州词派是现代词学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传统资源,现代词学的起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常州词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立场和对话方式紧密相关”。^{[20](P3)}陈洵的《海绡说词》,正是诞生于这一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之中,既有延续常州词派“寄托比兴”的主观说词,又开始将评词重心移离词的格调、意指,转向探究“离合顺逆”的结构章法,运用“钩勒”“逆”“倒”等术语,拆解词作全篇蕴含的表意体系、结构秩序、叙事章法和抒情脉络,力求从形式的角度接近词作的美学特质。此种文本细读之法,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相较于以剖析词意、格调为主的传统词话,《海绡说词》具有明显的“现代性”。

当然,以文本细读解析词作结构之举并非陈洵独创,在稍前的周济、陈廷焯、陈澧等人的词学著作中亦隐隐可见。例如周济评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浪淘沙慢》(晓阴重)、《夜游宫》(叶下斜阳)。^{[21](P11, 21, 23)}再如陈廷焯评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22](P16-17)}又如同样出身岭南的陈澧评姜白石《琵琶仙》(双桨来时)、《疏影》(苔枝缀玉)等。^①对整体上的词作结构进行拆解,实际上是传统词学著作中潜藏的一条暗流,李清照即在《词论》中云:“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23](P289)},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她对摘句批评方式的反对,更加看重从全篇、全人和词史的角度评词^{[24](P85-103)}。

陈洵之所为,恰恰是将其进一步彰显出来。诚如刘斯翰所言:“陈洵的词论,虽然是继承周济的……但是,由于陈氏并未止于诸贤的片言只语、静态品评,而是通过对四家词尤其周吴词的独立钻研,深入一步,将自己的认识植根于具体作品的剖析和艺术手法的归纳,而显得十分坚实。”^[25]此外,前人词话作品也大多以同时品

评多位词人为特征,像陈洵这般专以梦窗、清真为专题者颇罕见。从以上各个角度来看,《海绡说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时的词学批评之法,诸如陈匪石《宋词举》、顾随《稼轩词说》、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俞平伯《清真词释》、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等,都十分重视对词篇运笔、结构之法的论析。

例如,明显受到陈洵影响的杨铁夫,在《吴梦窗词笺释》中不仅大量引用了《海绡说词》的内容,其中“逆入”“反应”等术语的运用,也可谓因袭了陈洵的词评路径。比陈洵稍晚的陈匪石在《宋词举》中试图:“详述其作法家数与命意用笔之方、造境行气之概、运典铸词之略,庶一经拈述即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26](P1)}在论词部分,陈匪石更是举一反三,对词作结构、句法等详细拆解。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也对《海绡说词》多有引用、评价,刘永济强调:

“读周(邦彦)词须看其疏密相间,虚实互发处,而笔姿宛转流美,意趣不穷,复有无垂不缩之妙。”^{[27](P109)}唐圭璋也曾对《海绡说词》致意:“一词之起结、过片、层次、转折,脉络井井,足资借鉴。”^{[28](P241)}

这些与陈洵同期或稍晚的词学家,均看重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词作形式和句法结构的探究。虽然《海绡说词》的主旨仍未脱离学词之导向,但其治学之肌理中包含了对形式主义的发现和拓展,给旨在格调、境界及还原作者真实面目、重新估量词人在词学史地位的“批评之学”,拓宽了另一条文本分析的路径。此种治学方式,非常符合现代学术体系对文本本身的侧重。《海绡说词》的具体成果则是对周邦彦、吴文英词的分析,时有度人金针之处,不仅“把文学文本看作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充分发挥功能的‘有机结构’”,更是“试图把文学文本理解成整个文学体系”。^{[29](P35)}特别是陈洵对吴文英词作的解读,可谓宋代至民初研究吴文英

①见陈澧.白石词评[M].龙门书店,1970.对“词体结构论”的分析阐释,详见黑白《陈洵释梦窗词之结构论及其词史意义》,此处不赘。

之第一人,也深刻影响了同代及后世学人对吴文英的研究。

其时,词坛恰逢“梦窗热”^①,以王鹏运为肇端,以朱祖谋为核心,对梦窗词的辑佚、校勘、笺释,对梦窗生平行实的考订和年谱的编订以及对梦窗词风的追慕,一时以来成为词坛风尚。^[30]但梦窗词“外表芬铨丽密,内挟真气流转,结构特殊,修辞别出心裁,其实并不易学。”^{[31][P96]}那么,梦窗词究竟是否可学?又该如何学习?陈洵及《海绡说词》的出现,正是在词学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一难题,对词选和词学专著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或许这也是朱祖谋对其念念不忘的原因。虽然《海绡说词》主体部分已然有从填词到鉴赏的现代词学趋向^[32],但陈洵在鉴赏的字里行间,在对词意、笔法、结构的释读之中,最终指向的仍是如何通过学习吴文英、周邦彦来作词,其主旨在于授填词人以渔,而非词学理论层面的自觉。

朱祖谋、龙榆生、唐圭璋等人在辑选宋词时,一并将《海绡说词》的相关内容收入其中;杨铁夫、罗忼烈、吴蓓等人在笺释清真词、梦窗词时,也每每参考《海绡说词》。此外,刘永济、张伯驹、叶嘉莹等学者,在自身的词学著作中,都将《海绡说词》当作宝贵的对话资源。以上种种,均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学人和著作,他们虽褒贬不一,但都将《海绡说词》当作重要的对话资源。由是观之,《海绡说词》“超越前贤、施惠后人”实非过誉,无论是对词作普遍章法结构的挖掘,还是对吴文英词的个案研究,陈洵都对词学的“批评之学”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贡献,也令粤港澳区域的词学理念逐渐融入全国性舞台,理应得到学界进一步的重视和深度开采。

自陈洵之后,粤港澳词学可谓代有才人。詹安泰、饶宗颐、罗忼烈、朱庸斋等人的词学业绩,无不有口皆碑。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词学体系渐趋成熟,粤港澳词学在个案研究、整体研

究、理论研究等方面,皆领一时之先。施议对不仅提出宋词四家说、民国四大词人等,也率先提出词体结构论。张海鸥提出词的叙事性,其论绵延至今。彭玉平通过王国维、况周颐等个案研究,推动了晚清民国词学的整体研究,其授业弟子之中亦有众多从事词学研究者。肖鹏、曾大兴等创造性地将文学地理学与词学相结合,开拓了一片新的研究场域。余意编纂《岭南词话汇编》,首次对现存岭南词学文献作全面的收集和梳理,并进行了点校。不仅如此,新一代青年学者亦汇聚于此,如李小雨、刘梓楠、莫崇毅、彭建楠、施志咏、王卫星、吴志廉、徐玮、曾智聪等,都已在词学领域崭露头角。综上所述,粤港澳词学善领一时之先的特质,可谓薪火延续、代不乏人也。

参考文献:

- [1]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余意.陈洵致朱祖谋书廿一则[J].词学,2011(2):301-313.
- [4]朱祖谋.致陈述叔书札[M]//陈洵,著.刘斯翰,笺注.海绡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吴嘉慧.陈洵及其《海绡说词》研究[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 [6]龙榆生.陈海绡先生之词学[J].同声月刊,1942(2-6):81-125.
- [7]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M]//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 [8]裘尚中.海绡词卷三后记[M]//陈洵.海绡词.影印本.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发行,1961.
- [9]余铭传.海绡词卷三后记[M]//陈洵.海绡词.影印本.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发行,1961.
- [10]李文约.朱庸斋先生年谱[M].香港:素茂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2.
- [11]朱庸斋.分春馆词话[M].陈永正,徐晋如,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3.
- [12]陈洵.海绡说词[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冯平.宋词绪[M].香港:太平书局,1965.

①胡适亦从反面不无夸张地说:“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参见胡适.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7:305.

- [14]古直,黄纯仁.文学杂志[M].徐晋如,校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 [15]邓骏捷.民国澳门词人冯秋雪的创作及其地位[J].中国韵文学刊,2018(4):97-101.
- [16]朱惠国.社会转型与晚清民国词学流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 [17]范松义.清词的地域性与地域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7):139-146.
- [18]彭玉平.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0.
- [19]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M]//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0]张耀宗.现代词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 [21]宋四家词选 词辨[M].周济,辑撰.石任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22.
- [2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23]李清照.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M].徐培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4]彭玉平.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 [25]刘斯翰.《海绡说词》研究[J].学术研究,1994(5):101-105.
- [26]陈匪石.宋词举[M].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
- [27]刘永济.微睇室说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8]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9]拉曼·赛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0]彭玉平.朱祖谋与晚清民国时期的梦窗词研究[J].词学,2004(1):172-196.
- [31]徐玮.经典之重写与重探:晚清民国词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32]戴伊璇.“填词”的离场——由民国词话之演变管窥现代词学萌芽[J].词学,2023(1):194-211.

【责任编辑 史 敏】

Chen Xun and the Ci-Poetry Genealog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I Bai

Abstract: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dvantages in external exchange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is often the first to perceive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era. In the field of ci-poetry, this has manifested as a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particularly adept at leading contemporary trend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region's ci-poetry genealogy can be outlined: one main thread focuses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i-poetry, and three branches cover three shifts—of regional concept from Lingnan to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of identity from traditional ci poets to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of research concept from ci composition to ci studies. Its form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ci poet groups gathered around leading cultural figures. Chen Xun is situated within the genealogy of ci-poe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As the “Lingbiao Master of Ci,” he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i-poetry. Firstly, Chen Xun's *Haixiao Ci-poetry*—ranked alongside that of Kuang Zhouyi, one of the four great ci master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combined with his teaching of ci-poetry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and his composition exchanges with friends, established a clear paradigm for learning ci-poetr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 form. Secondly, Chen Xun's *Haixiao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which focuses on commentary on compositional structure, deeply influence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later ci scholars, initiat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impressionistic commentary to structured analysis. After Chen Xun, scholars such as Zhan Antai, Luo Kanglie, Zhu Yongzhai, Qiu Shiyu, Shi Yidui, Chen Yongzheng, Huang Kunyao, and Peng Yuping all advanced to the national level and made innovat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t can thus be said tha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s ci-poetry, characterized by its ability to lead the trends of the era, has seen its torch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 no lack of worthy successors.

Keywords: Chen Xu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Ci-poetry genealogy; *Haixiao Ci-Poetry*; *Haixiao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